

605122/4050
0195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防止和平演变与加强政治工作
——兼论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袁克人

空军政治学院(上海)

1991年7月

论 文 提 要

我党的历史证明，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实现的政治优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主要依靠。今天，在国际敌对势力加紧进行和平演变的考验面前，我们仍然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优势，来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那富有远见的深刻分析，已经为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所证实。但是，他晚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包括用“突出政治”的思想指导政治工作，却严重地削弱了防止和平演变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力量。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又科学地总结了“文革”的教训，对新形势下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从加强政治工作，防止和平演变的角度研究，这方面的创造性贡献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政治工作一定要把保证四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为此，就必须同时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保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和平演变的实质是思想渗透引起的政治蜕变，政治工作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要课题。在这场斗争中，不是象过去那样搞政治运动，而是主要采取“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方法，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点在争夺青年，政治工作在新时期就是要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青年一代而奋斗；其中，理想与纪律又是重点。

（四）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最有力的手段”是通过经援和贸易施加政治压力，政治工作必须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保证自己在改革开放中不受这种手段的侵害。

（五）防止和平演变的关键在党的领导权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政治工作必须致力于培养一支在领导四化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红专结合的干部队伍。它要求在加强党的建设中，把对革命接班人的选拔与培养工作建立在深化改革、健全制度的基础上；并在新时期的社会实践中，把合格人才的检验标准建立在红与专高度统一的基础上。

防止和平演变与加强政治工作

——兼论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我党七十年的光辉历程一再证明，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实现的政治优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主要依靠。今天，在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考验面前，我们仍然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优势，来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1959年11月，他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印发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几篇演说，指出：杜勒斯要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能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1964年，毛泽东同志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日程，他在6月16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后来，他又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并警告人们：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危险。^①

毛泽东同志是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的。他认为国际上存在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阶级斗争，这是外因；而我国内部还存在阶级斗争，使杜勒斯们搞和平演变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这又是内因。两者比较起来，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应着眼于内部的巩固和稳定。因此，在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即政治工作中，他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坚决打退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做好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保证；强调认真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做好防止和平演变的组织保证。这些都是富有远见的正确思想。但是，毛泽东同志晚年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最后导致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来反修防修，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一场灾难，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严重削弱了防止和平演变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

邓小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第二代的领导核心，继承了毛泽东同志防止和平演变的正确思想，同时用科学的态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改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他在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十分重视加强思想建设，始终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也十分重视加强组织建设，反复强调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各级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对新形势下造就一支经得起和平演变考验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从而维护与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种创造性的发展，从加强政治工作，防止和平演变的角度来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防止和平演变要求政治工作必须把保证四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表现为两种社会制度谁优谁劣的一场竞争，最终的结果

将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生活水平比较富裕，是他们宣扬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主要资本，也是他们进行的和平演变能够产生一定诱惑力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于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②因此，在三大改造完成前后，他曾经设想集中精力以比较快的步子进行经济建设，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主持通过了八大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政治路线。但是，1957年反右以后，他错误地估计了政治形势，动摇了重点抓经济建设的决心，逐步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八大路线，结果冲击了经济建设，使中国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生产力发展不快，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以致不能较快地摆脱贫困的境地，直接影响到我们在两种制度竞争中的实力地位，同时也使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失去了信心。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了教训，尖锐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③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积极促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历史性决定，后来又发展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他认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④因此，就是在发生6·4反革命暴乱事件的非常时刻，他仍然告诫人们，我们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政策都不变，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防止和平演变必然要求政治工作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人们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但是，要使这个宣传不是吹牛，不是放空炮，就必须首先保证四化建设这个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以我国经济实力蒸蒸日上、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事实来说服人。为此，有两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政治工作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时必须很好完成的：

第一，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为了把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同志力主实行改革开放。他总结了我国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深信闭关自守和墨守陈规搞不成四化，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四化。但是，他也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也给国际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施加影响，妄图使中国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有两条不同的改革开放之路：一条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主张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改革开放，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另一条是西方希望的，也是搞自由化的干将追求的全盘西化的改革开放，其结果只能使中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我们的政治工作，不仅要坚决抵制后一种改革开放，而且还要大力宣传前一种改革开放是不怕资本主义“演变”的，是有办法克服它们的消极影响取得成功的，鼓舞人们建立起这样的坚定信心。

第二，保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了集中精力搞建设，邓小平同志又力主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因此，政治工作必须把保证实现政治上的稳定作为自己的头等任务，从各方面采取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措施，反对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言行，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促进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个世纪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

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⑥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到那个时候，和平演变在国内的社会基础就丧失得差不多了，我们宣布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刻才能到来！

（二）防止和平演变要求政治工作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要课题

国际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的实质就是通过思想渗透引起政治蜕变。他们主要是用资产阶级的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等影响我们，取代无产阶级的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正是这种思想渗透的集中反映。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们的思想，改变党的路线，最后颠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同志对这一点是有高度警惕的，始终一贯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鉴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但是，他晚年提出的反修防修口号，由于对修正主义的概念缺乏科学的界定，也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坚持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正确主张，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既具体明确地说明我们在这场斗争中要坚持的主要内容，又科学地界定我们要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强调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将贯穿于整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1990年初中央批转的全军政工会议纪要，更明确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们当前政治教育的主课，而且要贯穿到各项教育中去。这样，在反对和平演变的主战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我们的任务更加明确了，鉴别是非的主要标准也更加清楚了。

“自由化”是当前和平演变者手中用来瓦解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武器，是他们实行“攻心战”的核心内容。尽管国内和党内曾经有人加以掩饰和美化，说它们是“思想解放的标志”，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但是邓小平同志以其特有的政治敏锐性，从这种思潮一露头就揭示了它的本质。他认为，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并且特别指出，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⑦因此，在每一次自由化思潮兴风作浪的时候，无论是借人权问题攻击社会主义没有民主自由，还是借政治改革鼓吹资产阶级“多党制”，他都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旗帜鲜明地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正是通过这几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启示，人们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反对和平演变斗争中所处的特殊地位，真正体会到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对防止和平演变所起的巨大作用。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⑧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他从50年代后期开始就频繁地采取搞运动的方法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造成了人所共知的严重后果。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吸取了历史教训，恢复和发扬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他坚决反对再搞大规模的运动，认为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带头提出禁止再搞

“四大”，因为这种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他认为，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要正面教育，积极引导，其基本方法是“透彻说理，从容讨论”，是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超出思想认识范围的违法乱纪问题，则要依靠法制的力量去解决，并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等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他多次批评思想战线上的软弱涣散状况，主张领导的态度一定要坚决，要打主动仗。他认为，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这个方向就是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要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形成一种全国范围的倡导正气、抵制歪风的气氛和声势。他要求文艺工作者“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要求科学工作者“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地去攀登科学高峰，认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的精神就是“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要求理论工作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以填补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理论“空白”。他特别提到，四项基本原则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③应该说，这就是新的历史时期摆在每个政治工作者面前的经常性的教育任务。过去有一段时间，这个教育进行得不经常、不连贯、不深入，是造成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重要原因。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强调把它放在主课位置，以及采取一手抓扫黄，一手抓繁荣文艺等一系列积极措施，正是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的具体表现。两年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深入开展下去，思想战线的形势就会越来越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就会越来越大，和平演变者梦想实现的“自由化的春天”将越来越化为泡影。

（三）防止和平演变要求政治工作必须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青年一代而奋斗

青年是未来的希望。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既然是长期的，是跨越世纪的，决定最后胜负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在青年的身上，争夺青年一代也就必然成为这一斗争的重点。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无非是因为新一代的青年没有经历过革命风雨的磨炼，受革命传统的影响比较小，比较容易受帝国主义的蒙蔽和欺骗。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们都强调在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中一定要教育好青年一代。毛泽东同志说过：“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困难，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要靠老一辈的人把过去的经历告诉他们，对他们进行教育。”^④邓小平同志也说：“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⑤但是，怎样教育青年一代，现在同过去比较，环境与条件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健在时，我们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留给人们的印象还很深，建国后开始经济建设的一段进程又很顺利，因此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参加社会实践锻炼比较容易取得好的效果；而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刚经历了“文革”的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遇到新的曲折的时期，青年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还没有很好的恢复过来，这给党的教育带来很大的困难。邓小平同志针对这些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的“四有”要求，并且明确指出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没有理想，没有纪律，

就会象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所以，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⑩这样，把新时期培养青年的目标和重点明确了，问题就是要在开放的环境里，在各种不同思想的较量中，排除一切干扰，努力争取实现这个目标。

革命理想历来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过去为什么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⑪他的话是有的放矢的，因为今天国际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的手法是双管齐下：政治上竭力夸大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误，诬蔑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建设失败了，同时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多么美好，力图破灭青年人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在思想上则竭力攻击共产主义精神是空洞的幻想，共产主义道德超越了时代，同时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个人利益至上，“一切向钱看”等等，一心要打掉青年人作共产主义新人的愿望。要抵制这种思潮的侵袭，政治工作要针锋相对地宣传资本主义是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和绝望的，建设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根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而共产主义的精神境界更是要比资本主义高尚千百倍，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就是青年人追求真善美统一的过程。在这里，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宣传邓小平同志倡导的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发扬的五种精神（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努力实现邓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就是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⑫

纪律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⑬所以，搞“和平演变”的人最怕我们的青年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他们一方面竭力攻击民主集中制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鼓吹绝对自由、民主，想把青年的思想搞乱；另一方面又在生活方式上引诱人们自由散漫，追求放荡不羁的生活，置国家的法纪于不顾。因此，政治工作一定要在青年中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要从纪律与民主的关系上，说明“没有民主就没有自觉的纪律”和“不要纪律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道理，并且通过重点加强党的纪律去影响青年，影响全体人民提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有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在前，自由化思潮毒害在后，今天青年的理想和纪律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此，性急是不行的。邓小平同志说：“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十年的努力不行。十年育人嘛！”“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⑭我们反对“和平演变”斗争的胜负，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以“育人”的最后结果为标志的：下一代下两代是跟党走还

是离党而去，是培养成“四有”的新人还是被自由化思潮带坏了，这是摆在党的政治工作者面前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只要政治工作做好了，使青年人不仅有文化有道德，而且有共同的革命理想，自觉遵守铁的纪律，那么我们的政治优势还在，我们在斗争中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四）防止和平演变要求政治工作必须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应该说，帝国主义用经济封锁的办法也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施行政治压力也好，或者通过贸易手段进行思想渗透也好，这些“最有用的手段”在新中国一直行不通。无论是毛泽东同志还是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都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坚定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在这里，坚持自力更生同坚持改革开放是不矛盾的。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同外国做生意，争取外援，进行经济往来，都是加速四化建设的需要，有利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不仅要坚持做下去，还要做得更好。但是，我们的立足点始终要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上，只有这样才能有条件更好地扩大对外开放。因为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过去一些比较小的工资很低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有发达国家的支援，它们的廉价产品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钻空子，加上资本家把高额利润分一点给这些地方的劳动者，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改善得比较快的话，那么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决不可能走这种“捷径”，我们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⑩因此，他把“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精神”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四个前提之一，并且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专门作了一大段论述，庄严地宣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事实证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越牢固，我们才能在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不让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这对于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防止和平演变来说，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原则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情况，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1989年以前“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没有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告诫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⑪党内个别高层领导人，在这方面也缺乏清醒的头脑，有的不恰当地提倡高消费，有的纵容干部经商，搞特殊化。正是由于引导不力，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了不少，干部中追求安逸享乐、青年中崇洋媚外等倾向滋长了，党内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没有根本扭转，建国后已经绝迹的某些丑恶现象在社会上重新出现。这不正是和平演变者早就希望见到的吗？它的后果，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⑫

因此，政治工作在这方面担负着特别繁重的任务。邓小平同志要求，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几十年。一方面要号召“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⑬

这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是不容易做到的，但却显得特别重要。如果高级干部本身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因此，我们决不能跟在某些自由化的鼓吹者后面，也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共产主义思想不需要提倡了，“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恰恰相反，必须更加提倡廉洁奉公、乐于奉献的精神，把商品经济发展引来的某些消极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管干部的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领导干部要置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要健全党的生活制度，完善群众举报制度。毫不手软地查处违法案件，从具体事件抓起，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党纪国法办理。只要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形成长期奋斗、艰苦创业的新时代的延安精神，那末战胜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五）防止和平演变要求政治工作必须致力于培养一支能在领导四化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红专结合的干部队伍

国际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能否得逞，最终还是决定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特别它的领导层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党的领导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那就必然自家乱了阵脚，群众迷失了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就会最终改变颜色。因此，毛泽东同志把警惕党内特别领导层出修正主义当作一个战略思想提出来，是很有道理的。这一预见，已经被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所证实。邓小平同志和陈云等老一辈的革命家一起，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方面认真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纠正个人选接班人等错误的做法；另一方面仍然十分重视继承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把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他们退下来前要完成的最主要的、第一位的任务来看待。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至少有两条是必须在政治工作中加以认真贯彻的：

一是在加强党的建设中，把对革命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工作建立在深化改革、健全制度的基础上。选拔接班人不是孤立的，只有我们党的建设好了，党的生活是正常的，党内制度是健全的，才能保证选拔的领导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岗位上能够始终如一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办事。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因此，他力主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废除领导干部任职的终身制，改革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不分等弊端，要求从中国国情出发，采取稳妥的步骤，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列为政治改革的远大目标。政治工作必须加强党的建设，保证领导制度改革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以创造四化建设新时期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

二是在新时期的社会实践中，把合格人才的检验标准建立在红与专高度统一的基础上。过去，我们吃“空头政治”的亏够多了。现在搞现代化，越加觉得有知识的人才的重要，加之“文革”对知识的贬低和人才的摧残非常不得人心，因此，邓小平同志1977年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总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担心，好象知识多了，文化高了，就容易背离马克思主义，容易接受民主社会主义、自由化一类的思潮。难道领导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知识和文化就一定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相容，不能统一的吗？邓小平同志在实践中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首先论述了红与专的关系，提出了“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的论点，尖锐地批评了“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

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的现象，认为这就谈不上“红”，并且指出，新时期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②给政治工作选拔人才如何做到红与专的统一指明了方向。接着又提出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选拔人才，配备班子，并且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之一是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他主张到四化建设的实践中去发现人才，不少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又有专业能力，就是很好的人才；也在历次反自由化的斗争中发现人才，不少有知识、有能力的领导者，在复杂的形势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就得到了重用。反之，对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搞打砸抢、搞派性的人，坚持一个不用；在与自由化的斗争中丧失原则、动摇变节的，也不能用。这里，仍然坚持了革命化是第一位的老传统，但赋予了新的内容；也坚持了红专统一的老传统，只不过同过去战争年代的统一相比，有了许多新的特点，例如现在搞建设，行业非常多，要做到这个统一更不容易了，目前是专业人才太少，必须大力扶植和培养。看来又红又专的问题提出许多年了，由于执行起来经常出偏差，也争论了许多年。关键还是要象邓小平同志那样讲究实际，使我们选拔的人才既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又要有建设四化的本领，而且老中青相衔接，能够一代又一代地把我们的革命事业延续下去。这样，我们才真正不怕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保证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防止和平演变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总结我们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可以说什么时候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都抓起来，不是只抓其中的一项，我们防止和平演变的力量就强大；什么时候把“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纠正了，不走极端，少犯片面性，我们防止和平演变中的政治优势就能充分显示出来。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最大贡献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防止和平演变正确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在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关键时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又大力纠正了我党多年来犯的“左”倾病，把搞现代化建设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与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部的革命化与知识化专业化等等真正统一起来了，从而引导我们的政治工作在比战争考验更复杂的和平演变考验面前，学会“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历史将会证明，只要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政治工作是能够在保证四化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发动群众组成一道铜墙铁壁的，在它面前，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必然会遭到彻底失败！

注释：

- ① 参看逢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一文，见《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1期第5—6页。
- ②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
- ③ 总政治部编印《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94页。
-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4、215页。
- ⑤ 总政治部编印《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72—173页。
- 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3页。
- ⑦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764—765页。

- ⑧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91、166页。
- ⑨ 《1963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转引自《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1期第10页。
- ⑩ 总政治部编印《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200页。
- ⑪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0页。
- ⑫ 同上第99—100页。
- ⑬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 ⑭ 同上第363页。
- ⑮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0、128页。
- ⑯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1页。
- ⑰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摘录》第34页。
- ⑱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1页，《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8页。
- ⑲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4页。
- ⑳ 同上第226—227、141页。